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De
LuoJi QiDian Yu Shijian YuanQi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逻辑起点 与实践缘起

■ 张 龙 著

ZhongGuo TeSe SheHuiZhu Yi De
LuoJi QiDian Yu Shijian YuanQi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逻辑起点 与实践缘起

■ 张 龙 著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 大 连 •

©张 龙 20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与实践缘起/张龙著.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652-1589-6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9077 号

出 版 人:王 星

责任编辑:吕英辉 刘晓艳

责任校对:王文慧 杨焯理

装帧设计:周佰惠

出 版 者: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大连市黄河路 850 号

网 址:<http://www.lnnup.net>

邮 编:116029

电 话:(0411)84259910

印 刷 者:大连图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70mm×230mm

印 张:14

字 数:240 千字

出版时间: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52-1589-6

定 价:33.00 元

2012年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W2012117)

辽宁省一流特色学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 资助项目

本书由
辽宁师范大学
学术专著资助出版基金
资助出版

BENSHUYOU
LIAONINGSHIFANDAXUE
XUESHUZHUANZHUZIZHUCHUBANJIN
ZIZHUCHUBAN

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至高、至大、至深、至远的概念。不但它的内涵无比深刻,它的外延更是无比广阔。它不仅代表着一种理论、制度和道路,更象征着广大中国人民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它是在近现代特殊的世情、国情和党情下形成的。之所以要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实践缘起,是因为事物的起点往往就决定了它的未来,所以我们只有明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才能更好地预测它的未来走向。

书中作者所探讨的逻辑起点和实践缘起从多个不同角度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走的历史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近现代世情、国情和党情相互交织发展形成的一种耗散结构,其中不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先期理论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埋下的理性种子,还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给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时校正。

从大世界观和大历史观的角度看,对当代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我们都不能再采取过去那种简单对立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必须以世界历史为视域,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过去那种历史纵向的扬弃关系来理解当今世界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共同发展的横向借鉴、吸纳、内化、创新、超越的关系,如此才能正确面对当前社会主义底子薄、起点低的现实,才能形成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发展道路。唯此,经伟大复兴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普遍价值才具有世界性,才能代

表并引领着未来世界的发展走向。

以上只是从浅近直接的角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为“中国特色”，这其中必定具有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根源基础。我个人认为，并建议在这一方面挖掘或拓宽研究领域，即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一定的根植性作用。因为它不仅决定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更是对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这种耗散结构的形成起着凝聚、整合、提升的作用。它不仅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与“中国梦”都有着内在联系。我想，加上这一条才能更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

曲庆彪

2014年9月10日

前言

回首过去,近代以来中国走过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未来,中华民族充满了希望。在新世纪里,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关乎中国共产党的命脉、中国的前途、中华民族的命运、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在中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在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历史代价后,终于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中国人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为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基础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在历史实践中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缘起,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指明其背后的逻辑特性,从而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共存、相容、同发展的时空悖论。伟大的中国人正是在运用辩证思维的基础之上,超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体悖论,大胆实行改革开放,不但从国际外围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而且还敢于在把握一定分寸的基础之上,从自我体内发展,利用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是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启发下,在实践中的伟大创造,理论上的巨大提升。不仅在中国开辟了一条具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De Luoji Qidian Yu Shidian Yuanqi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逻辑起点与实践缘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为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参考。

本书在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时,遵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史论结合的原则。具体来说就是用理论来解说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脉络,用历史现实来验证理论的合理内核。同时,还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抽象的辩证分析法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尤其是簇理论方法的应用,本文中引用了多种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看上去非常不同,但都可以看作是同一个基础理论的某些方面。它们中的任一理论作为理论母本,只能应用于有限的领域,但在这些不同理论母本的重叠领域,它们又在预测着同样的逻辑内核。因此,在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很好地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复杂图景的情况下,本书则采用簇理论的方法来对其进行多维的立体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与实践缘起是一个逻辑序列,相对于人的认识而言,它也是一个逐步展开的历史过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掌握和运用它。本书中所梳理的逻辑起点与实践缘起是那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至关重要的、具有转折意义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构成了这个时代链条的主要环节。

本书的基本逻辑结构在于:第一,首先在理论原点上,认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思想,尤其是其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理论,从纯理论逻辑推理的角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整个中国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围绕在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展开。第二,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深入思考并初步实践了在贫穷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尝试。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涉及了贫穷落后国家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深刻问题,这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之二。第三,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进行了深刻的思索,与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相联系,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伟大的理论创新经过了革命边区、抗日根据地及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验证。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这一伟大的理论与实践和伟大的新经济政策及其实践一样,都没能破解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悖论,在思维方式和实践模式

中都陷入了片面性,导致这两种伟大的理论创新都在短期内夭折。但这种伟大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从自我验证的角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实践缘起。第四,曲折发展的岁月与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逆向探索,“物极必反”在这里得到了充分显现。无论是这一过程中的正向经验积累,还是反向教训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实践缘起之二。第五,从传统意义上讲,现代社会主义由于特殊的历史时空和现实条件,不能缺少资本主义这个物质基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更是从对象性的角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调整和改革提供了参照。第六,在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实践缘起的基础之上,本书回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历程,解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综合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成果的基础之上达到了中观正见的理性高度,通过贯彻“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念,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境界。

目 录

第一章 东方社会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之一

- 第一节 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背景 3
- 第二节 东方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 11
- 第三节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 19

第二章 新经济政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之二

- 第一节 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的历史背景 29
- 第二节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实质 37
- 第三节 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启示 50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缘起之一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确立 63
-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内涵 69
-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内在逻辑 89

第四章 曲折发展与“文化大革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缘起之二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De Luoji Qidian Yu Shidian Yuanli

逻辑起点与实践缘起

第一节	曲折发展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取得的宝贵成果	103
第二节	曲折发展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取得的基本经验	108
第三节	曲折发展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惨痛教训	115
第五章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借鉴		
第一节	当代资本主义的积极新生因素	127
第二节	当代资本主义的痼疾尚未根除	137
第三节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	149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基本内涵		
第一节	邓小平独特的理论素质和理论勇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前提	165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173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	179
结束语		201
参考文献		203
致谢		213

第一章

东方社会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之一

任何伟大的思想、科学的理论,总是继承前人、发展创新的成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渊源,新的理论观念很难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没有多少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没有马克思主义奠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理论源头上来看,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尤其是其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解了现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行前进的时空悖论。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合理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渊源。它最初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以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为背景,以印度、中国和俄国等东方国家为研究对象,在研究东方社会的性质、结构、历史演化及其现状的基础上,着重探索东方社会如何通过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的新形式走向世界历史、实现现代社会转型的理论。

第一节 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背景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在探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时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对他在50年代形成的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他突破了原先得出的东方社会不能超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结论,以科学的求实精神初步总结了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可能性和现实条件,这就是在世界历史体系中考察东方社会的特殊性,同时又在东方社会超越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指出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制约作用。

1.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16—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建立了自己的牢固统治,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被“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①所代替。从此,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然而,资本主义并未给人类带来其所主张的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虽然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得以迅猛地发展,但却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极度的两极分化,广大无产阶级处于极度贫困的边缘。基于资本主义给人类所带来的巨大苦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就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

尤其是 1848 年的欧洲革命更使马克思对此深信不疑。他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者书》中指出：“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有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①然而，无产阶级革命不但没有葬送资本主义，相反使资本主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为自己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道路。

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陷入低潮，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蒸蒸日上的条件下，马克思通过反思自己的理论，认识到社会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灭亡主要将取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深刻矛盾。他在总结 1848 年欧洲革命失败的经验时强调：“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②马克思虽然修正了自己的革命理论，但他的革命热情却丝毫没有减退，因为他深信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一定会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这些生产关系也必然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届时社会革命的时机就来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会敲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判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标志。“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③正是基于这种信念，马克思即使是在无产阶级运动的低潮时期仍然坚信资本主义的灭亡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在他的有生之年，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曙光将再次升起。不出马克思所料，1857 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爆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6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13～51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14 页。

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这一次事情具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全欧规模,我不认为我们还能长久地在这里当旁观者……‘动员’我们的人的日子不远了”^①。然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却并没有带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在1873年那次空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马克思也曾预言:随着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普遍危机”又要临头了。可这场危机不但没有带来无产阶级革命,也没有敲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资本主义反而进入了30年“和平”发展的黄金时期。

多次预言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的落空,导致马克思不得不重新估量自己的理论。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回顾了马克思和他本人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②于是,马克思在晚年中断了《资本论》的创作和出版,开始转向人类学研究。

长期以来,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中始终存在着密谋性、宗派性和垄断性的倾向,一直充斥着各种宗派组织之间的剧烈斗争。如法国的工人运动深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在英国的工人运动中工联主义一直占优势;意大利的工人组织在马志尼的领导下,主要从事密谋和恐怖活动;德国的工人运动在拉萨尔的影响下,则崇尚改良主义。尤其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德国的拉萨尔派、法国的可能派、英国的工联主义和费边社等为代表的改良主义在欧洲无产阶级运动中日益强化,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对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无产阶级运动中的指导地位形成了巨大的挑战。直到恩格斯逝世,马克思主义也没在工人运动中形成中心地位,相反,从恩格斯逝世一直到20世纪初,工人运动中却掀起了一股修正主义思潮。

总之,由于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估计不足,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行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7~598页。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De Luojī Qidian Yu Shilian Yuanqi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逻辑起点与实践缘起

灭亡的预言屡屡落空,加之工人运动又向改良主义的方向发展,马克思中断了《资本论》的创作,并开始反思自己的理论,把注意力投放到人类学的新进展与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的革命道路上来。

2. 东方社会发展的新方向

东方社会的巨大变化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过程开始的。当资本的战车刚刚在西方的土地上启动时,它就不可遏制地冲向全世界,企图把所有的非资本主义国家都当作资本原始积累的残暴的掠夺对象。在资本殖民主义侵略的暴力下,东方的十几个国家相继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西方资本主义向东方的扩张过程中,俄国却免于遭受殖民化或半殖民化的厄运,相反,到19世纪中叶,“俄国一直牢固地保持了世界宪兵的荣誉”^①。欧洲残存的封建势力把沙皇俄国看作是它们的主要支柱和最后堡垒。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号召欧洲的革命民主力量对沙皇发动一场革命战争。他们认定,打击、削弱和摧毁沙皇俄国,是欧洲革命胜利的必要前提。虽然沙皇俄国在19世纪中叶前后一直扮演着气势汹汹的欧洲宪兵的角色,但在西方资本主义强有力的冲击下,也面临着彻底崩溃的命运。可见,在19世纪中叶前后,东方社会正处于蜕变时期:它们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之下,正面临着崩溃的命运。在历史造就的这个巨大变革的转折关头,东方社会向何处去呢?

东方社会在寻找新的出路。东方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合力,推动着东方社会从旧的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的转变。1861年,俄国进行农奴制改革,这是俄国历史上从封建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折点。农奴制度的废除,使农民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解决了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自由雇佣劳动力的问题。通过赎金方式向农民掠夺资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满足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列宁评价说:“如果总的看一看1861年俄国国家全部结构的改变,那就必然会承认这种改变是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的一步。这不仅从经济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且从政治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②如果说俄国由于传统和地理因素,使得它能够比较主动地迎接资本主义的挑战,那么,中国和印度则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8页。

^②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6页。